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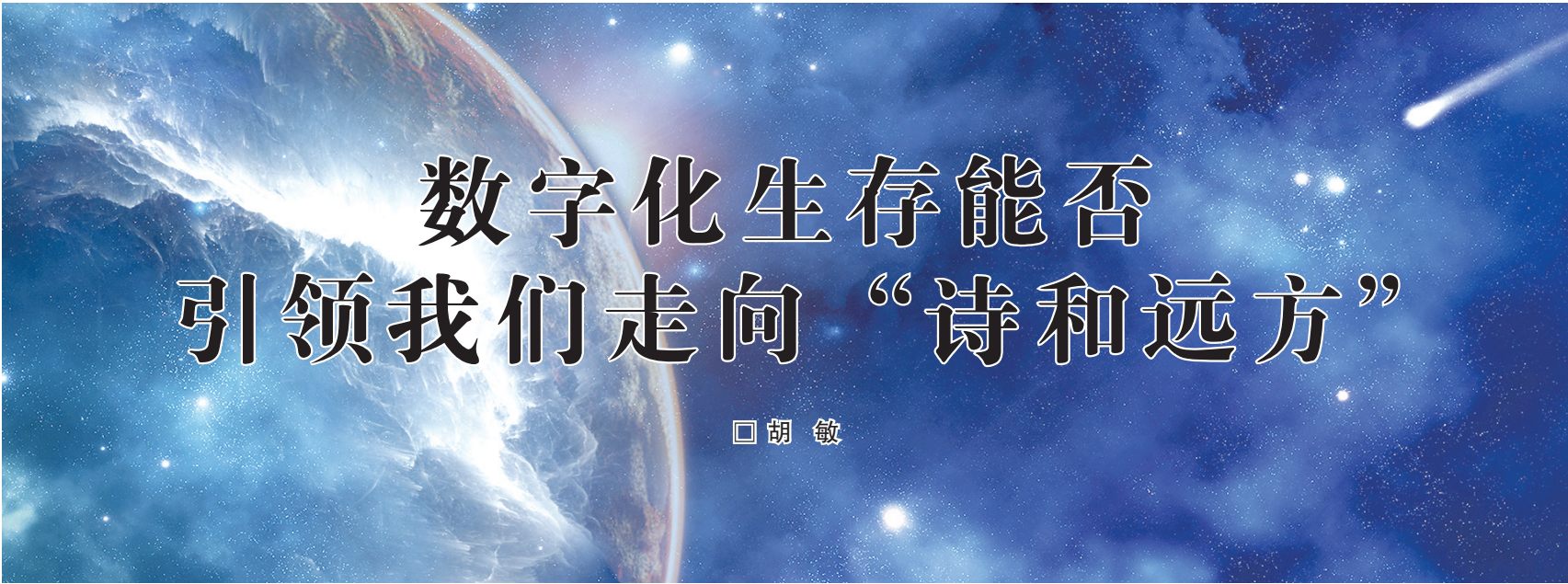
本报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在“数字世界”版开设了“数字科技名家谈”栏目，至今先后一共刊发12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有国家工信部的领导同志，有长期致力于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也有直接从事数字科技产业研发的一线工作者。专家们多方位、多角度地探讨了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价值和深刻影响，读来颇受启发，许多网站和公众号对这些文章都作了转载。该专栏办得是成功的。

今年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冲击，我们在悲悯人类应对病毒传染灾难还有诸多脆弱性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点亮了“黑暗隧道前的一抹曙光”。这些或是在疫情前刊发或是在疫情期间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揭示出一个共同性结论，就是人类要能够应对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更好适应愈加不确定性的世界，更好创造美好的未来，必须依靠科学的智慧、科技的力量，新科技革命一定能够让人类突破重围、涅槃求生。这其中，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无疑是很值得期许，这也是我们定义新生活、开启新时代的重要力量。在此，笔者结合对专家文章的学习，结合疫情形势下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和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未来，谈一点零散感想，作为该栏目的收尾。

20多年前一本《数字化生存》打开了什么？

记得还是在1996年，笔者采访刚刚回国创业的张朝阳，那时候他刚刚创办爱特信科技公司，致力于在中国创办一家有影响的互联网公司。访谈中他就笃定地认为互联网对中国崛起一定会起到很大的助推作用。张朝阳创办公司的部分风险投资来自他留美期间的一位老师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尼葛洛庞帝是美国著名的《连线》杂志的创办人和专栏作家，被西方媒体推崇为电脑和科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尼葛洛庞帝为国内读者熟悉得益于1996年末海南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他的新著《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张朝阳就作了大力推介。该书英文版曾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在国内翻译出版后也迅速掀起了畅销热潮，先后3次再版，发行近百万册。按照尼葛洛庞帝的解释，人类将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应用数字技



数字化生存能否引领我们走向“诗和远方”

□ 胡 敏

术(信息技术)从事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这便是数字化生存。作者当时就预言，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必将使人的生存方式发生革命性改变。书中描述：在数字化生存环境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如，生产力要素的数字化渗透，生产关系的数字化重构，经济活动走向全面数字化，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将被打上浓重的数字化烙印，人们通过数字政务、数字商务等活动成就着数字化政治和经济；通过网络学习、网聊、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网络就医等刻画出异样的学习、交往、生活状态。在这种数字化另类空间中，人们深度体验虚拟生存状态，感受网络人际交流的魅力，体会虚拟社区的逼真，尝试新型的情感交流，领略网络语言的千姿百态……总之，数字化生存方式既是对现实生活的模拟，更是对现实生存的延伸与超越。

如果说，20多年前尼葛洛庞帝对数字化生存方式的种种描述，让我们感觉还是对未来世界的一种梦想式“漫游”，但今天其所有的设想已经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活现实。如果将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看成是中国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启蒙书，那么，像张朝阳等一批互联网世界的科技创业家较早地将互联网引入国内，张朝阳后来创办搜狐，王志东创办新浪，丁磊创办网易等，培植起中国互联网事业迅猛发展的土壤，这批科技新锐也成为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拓荒者、书写者、实践者。20多年过去了，经过2000年一轮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洗礼，更多的数字科技和数字

经济的探路者风起云涌、承前启后、迭代创新，特别是2014年后移动互联网的崛起，阿里、腾讯、京东、美团等新经济公司新经济业态以全新面貌成为行业翘楚，继续引领中国的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阔步向前。由此说，数字化生存，开启的不只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打开了人类走进未来的通道。

疫情“大流行”凸显数字化生存的新价值

尼葛洛庞帝作为一位优秀的未来学家，在《数字化生存》中有一句经典的话，“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是把它创造出来”。在“未来已来”的今天，我们已经切身领悟到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这一延伸到未来的创新变革，是怎样改变了我们现实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我们的思考方式。该栏目的许多文章也都清晰地阐述了这一“改变”。

比如，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在《用好数字科技建设数字中国》中写道：“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互联网开始了大规模商用进程，国民经济进入到以互联网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阶段。通过互联网实现了高效连接，信息交互、业务协同的规模得到空前拓展，空间上的距离不再成为制约沟通和协作的障碍，中国经济社会开启了在信息空间中的数字化生存方式。”“数字科技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与融合，帮助个人和企业两端采用新的视角和新的手段，全方位、全视角展现事物的演化历史和当前状态，归纳事物发展的内

在规律，预测事物的未来状态，从而为决策提供最佳选项。”

国务院参事姚景源在《数字科技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中说，“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核心技术已经活跃在我国产业赋能的各个领域。其中，人工智能意在通过语言和图像识别、神经网络等技术延展人类智能，帮助企业更好地识别用户身份、预测用户行为和替代真人参与。云计算可以帮助企业整合信息系统、消除数据孤岛、快速部署和上线开发需求，增强获客、运营与风控创新能力，推动实体经济与金融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家工信部陈肇雄副部长在《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引擎》中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跨越发展的时代机遇、是构筑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是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是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促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新引擎。”据统计，从2012年至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2万亿元增长到31.3万亿元，总量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从20.8%扩大到34.8%，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一次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我们安宁的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秩序，但疫情期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形态呈现爆发式增长，引领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消费

方式变革，表现出强大生命力，也成为对冲疫情影响、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发展数字经济将为我国新一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带来重大机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王晓红研究员在《数字经济新业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记述：“网络办公成为疫情期间主要工作模式，在线教育规模迅猛增长，在线问诊成为重要的诊治手段，网络视频会议成为新的办公时尚，网络购物态势强劲，数字学习和数字娱乐快速增长，社交媒体成为防治疫情的主要宣传媒介……”

当然，疫情“大流行”将如何改变人类的未来生活，“非接触经济”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化经济运行模式，我们现在还无法回答，但窘困的现实是如此鲜明地凸显了数字化生存的新价值，这一生存方式已经深深嵌入到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已经到来的数字经济社会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必须面对、必须适应，最根本的是需要改变。

数字化生存能否引领我们走向“诗和远方”

音乐人高晓松有一句名言：“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不论其是怎样的心灵鸡汤，正在走向未来的年轻一代人希冀的是能够拥有一种平静美好的未来生活，这并不是奢望，但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巨大落差。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一定创造的就是美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近就指出，新冠病毒危机过后的世界将“大

为不同”，我们会面对一个伴随着风险的数字化程度更高的世界。他警告说，“未来将比过去数字化程度高很多，这将极大地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网络空间所有活动的发展，其中的一种风险，就是这种疾病会催生社会控制机制，这种未来图景已经开始形成”。因此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快制定规则和监管机制，避免社会控制机制被滥用。

陈肇雄副部长在栏目撰文中就指出，互联网立法要取得重大进展，信息安全立法要加快推进，要坚决打击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数字化治理能力要显著提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微在撰文提出，要建立健全监管标准体系，加强互联网领域安全生产、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公共安全等标准的制定和普及推广；要强化信用约束，科学合理界定平台主体责任，依法惩处网络欺诈、假冒伪劣、不正当竞争、泄露和盗用用户信息等行为。京东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陈生强在栏目文章中也表示，数字科技的归宿是为人和产业创造价值，最终实现人与产业的共生长，让科技创造美好未来的愿景成为现实。数字化生存就是要“以科技为美，为价值而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数字科技与数字经济赋予新的战略内涵，数据并列为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同的生产要素，这为中国数字科技发展与经济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也是数字经济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任何时代的技术革命都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能因为可能产生的负面就束缚了手脚，正如英国学者马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一书中写到的：“对人类来说最危险最不可持续的事情，就是为恐惧而关掉创新的出水口。”“尽管会出现许多挫折，可人类这一种群会继续扩展并丰富自身的文化。21世纪会是值得活一次的宏伟时代。”

如果相信人类能够保持足够的理性和乐观，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就可以把我们引向“诗和远方”。



编者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数据要素如何有效参与社会分配和价值创造，“数字世界”版将陆续刊发数据要素相关文章进行探讨。

以数据要素市场化促进社会信息化

□ 刘海军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指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一道作为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并可被市场化配置。数据要素市场化，有利于发挥数据驱动作用，打破利益约束、提升行政效能，必将疏通信息化参与主体、建设内容、协作方式等5个关键环节。

主动式进攻与互动式协作贯通。网络和信息化在电子政务、干部教育、辅助决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党政机关与互联网企业“需求—供给”合作模式，较好地解决了现阶段信息化建设难题。在此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数据、涌现的更多需求、扩张的业务范围、暴露的制度短板等问题，对信息部门提出极大挑战，部门之间数据不共享成为最大阻碍。数据要素市场化，意味着在彰显数据巨大应用价值的同时，有望借助市场手段优化资源配置、有力化解矛盾冲突。多部门协商提出需求、多企业协作加大供给将成为常态，即便是同一个信息化建设项目，以联席会议、小组攻关、模块分包等形式实施将更有效尝试。因此，党政机关及政府部门应尽快明确数据权责机制，加快形成资源

分配制度，建立健全数据监管体系，实现信息化管理主体多元化。

平台化支撑与集成化服务融通。政府、机关数据信息化重复建设、孤立发展、无法兼容等问题成为掣肘。数据要素市场化，就是要打破数据壁垒，以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实现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首先，要摒弃传统平台化思维，改变凡是信息化建设就是建机房、铺网络、增设备、找数据、买产品等线性模式。其次，可借鉴区块链去中心化、智能合约等信任机制，以开源共建、智能共享、算法共识、安全共治等内容为主，以数据有效流转和发挥效用为驱动，形成行政机关主导、技术部门协调、多方企业支撑的集成式服务模式。最后，应坚持以利旧整合为主、以标准制定为先的基本原则，具体应用要向国产化、产品化、规范化聚焦。

保姆式伺候与管家式帮扶相通。由于价值数据大多掌握在核心部门手中，数据使用和信息管理部门往往需要发出请示或请求才有机会获取数据，使获取数据的时间相应滞后。究其原因，一方面不可避免存在政务流程更替、基础数据更新等因素，相应的系统设计亟须调整优化；但另一方面，则是需求不明确、不聚焦，数据公开所致。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推进，以及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发展，数据获取、传输与交换将会更加公开透

明。因此，必须注重发挥数据的中介作用和引领效应，实现由技术保障向智力服务转变，在技术培训、业务咨询、规划设计、标准制定等方面提供支持，“授人以渔”方是破解信息化建设供给侧矛盾的有力武器。

项目制管理与委托代理制互通。无论在智慧城市建设，还是在党建系统开发等方面，项目制均发挥了资源调配、优势整合等重要功能。然而，由于后续相应的技术服务难以得到保证，导致信息系统越用越坏直至废弃。虽然有些使用单位保留了原始代码和基础数据，但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管理，无法进行系统更新与二次开发。唯有依托市场手段和专业力量，借助委托代理制等“第三条道路”，方可实现数据综合与标准统一。因此，可采取政企联合研发、共同出品等形式，加大信息化建设管理与推进；按照政府或有关行政部门决策、企业或技术部门执行等方式开展数据类应用系统开发；实现授权、放权、分权最大化，由可信企业或信息部门第三方维护管理数据，数据提供部门制定管理办法、分配使用权限、落实监督职责，使用单位评判数据质量、系统效能和运行效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数据使用与治理格局。

隐私安全性与数据可靠性共通。由于缺乏“安全感”，导致数据公开与信息共享成为信息化建设的“老大

难”问题。推动完善适用于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加强对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数据的保护。国家制度层面已经作出了指引和示范，各级政府和党政机关应当因地制宜抓紧出台相应规章制度。此外，诸多技术保密与防护措施得到实践验证，如区块链在金融、司法、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广泛使用；再如数据脱敏技术，可将不宜公开的数据格式转化，以“明码”或符号形式公开后安全使用。数据只有产生相互关联才有价值，与权责相关才会具备保密属性。因此，信息化建设的操作层面，常常采取以符号代替实名、以公开部分信息取代共享全部数据等方式，实现数据可靠性与隐私保护可信度相统一。通过将核心算法与公开数据分别部署、敏感信息与基础数据分存存储、系统优化与运行维护分开管理等方式，有效避免权力“打架”与系统“感染”，继而发挥数据的聚合优势。毋庸置疑，随着政务数据开放与社会数据价值更快融合，数据要素市场化更快推进，必将推动信息化建设更好发展。



(上接1版)在当前疫情形势发展错综复杂，人类共同面临历史上从未遭遇过的全球性重大危机的关键时刻，3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的中国倡议，强调了加强国际合作是预防病毒扩散和拯救生命的唯一途径，表达了中国与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强化政策协调、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的决心和信心，体现了中国在这场抗疫大战中的关键角色和大国担当，展示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形象。

这是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为世界的稳定性、不确定性注入动力和活力的政治宣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的共同威胁和挑战，有义务、有责任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对外工作要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不仅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要担负促进人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样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追求。因此，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担当，率先发挥大国作用，与世界各国携手抗击疫情，为世界各国战胜疫情力所能及地提供援助和支持，为维护全人类健康权和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和动力引擎。中国已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0%，特别是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努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社会发展，积极推动复工复产，确保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安全稳定运行，经济秩序有序恢复，经济运行稳定，在推动国际合作方面也发挥了示范作用，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庄严承诺，以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国际角色的确定性，努力减少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为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稳定，重塑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恢复正常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注入动力和活力。

这是要求领导干部胸怀两个大局、进行伟大斗争的政治动员。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这实际上是在认真研判当前纷纭变幻的国际形势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各种新风险新挑战的基础上，对广大领导干部进行的政治动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绝非坦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可能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要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矛盾中进行伟大斗争。因此，必须居安思危，坚持底线思维，树牢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凝心聚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